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绿洲廊道之上，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古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为庭州蒲类县县治，高昌回鹘、西辽和蒙元时期后沿，至14世纪中叶废弃。自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发掘了包括唐代院落遗址、高昌回鹘时期浴场、唐至元时期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等多处重要考古遗存，为深入认识唐朝墩在内的新疆唐至元时期城市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遗址的核心遗存：
丝路文明的物化载体

宗教建筑：多信仰共存的鲜活例证。遗址最引人瞩目的发现，当属城址北部中央景教寺院遗址与城中心的佛寺遗址。景教寺院位于城址北部中央，年代为唐至高昌回鹘时期。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外围建有围墙，内部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侧为寺院主体建筑，包括中殿、祭台、圣堂和后廊等结构;东侧为生活区，包括南部的庭院和北部的房址等，寺院出土的469块壁画残块中，包含头带十字架的圣像、红色权杖、棕枝纹样与回鹘文“也里可温”榜题，实证了景教在西域的传播与演变。佛寺遗址位于城址中心夯土台基之上，沿东西向轴线对称布局，由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构成，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泥塑佛像残块与壁画供养人形象，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柏孜克里克石窟等遗存风格一脉相承。值得关注的是，佛寺与景教寺院分居城址中部与北部，间距相近，且均沿用至蒙元时期，直观反映了天山北麓“多宗教共存”的历史图景。

罗马式浴场：东西建筑技术的交融典范。浴场遗址位于城址东北部，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整体建筑、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和北侧中心的灶址及左右两端的水井等相关遗迹构成。浴场为半地穴式结构，下层以与古罗马《建筑十书》记载的地热系统一致的砖砌支撑柱构建“挑空式地板”，炉灶燃烧的烟火通过烟道形成“地热”，维持上层洗浴空间的温度，上层则为洗浴活动空间，配套有水井、排水井与灶址。浴场与故宫武英殿西北始建于元代的浴德堂布局一致，可见罗马浴场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并未止步于天山北麓，而是伴随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持续东传，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建筑技术交融的典型实证。

唐代院落与街道：边疆治理的实物见证。遗址西北部的F6院落遗址，采用“减地法”从生土中挖掘构建，内部发现排列有序的方形隔间与袋状窑穴。出土了较多具有唐代风格的陶器，直观印证了唐代中原物质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西域边疆的传播，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紧密联系的实物见证。此外2024年新发现的东西向主干道L6，西接佛寺山门、东通城址东门，与南侧另一条东西向道路L5共同构成城址交通骨架，为考察城内街道系统与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依据。

历史语境中的唐朝墩：丝路文明的动态呈现

唐朝墩的发展历程与丝绸之路的兴衰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都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见证了丝路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唐代是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唐朝墩作为北



浴场遗址内部结构(东北-西南)



庭都护府下辖的戍堡，处于丝绸之路北道的关键位置。北庭都护府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立的重要军政机构，负责管辖西域广大地区，唐朝墩的设立也保障了北庭都护府与内地的联系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宋元时期，虽历经高昌回鹘、西辽、蒙元等政权更迭，丝绸之路整体格局发生调整，但唐朝墩的重要性并未衰减。这一时期，唐朝墩从军事重镇逐步转变为多民族聚居的聚落，城内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陶器、蒙元时期瓷器残片及多种语言遗物，均印证了西域地区在政权交替中文明的持续延续与发展。尤其蒙元时期，东西方交通再度迎来繁荣，唐朝墩作为丝路北道的重要节点，将曾在西域盛行的佛教与逐渐传播的景教实现和平共处，这种多元宗教与文化的包容共生，正是丝路文明“和而不同”特征的生动实证。

纵观唐至蒙元的漫长岁月，唐朝墩如同一座浓缩丝路文明的“舞台”，不同时代的军政治理、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均在此留下深刻印记。这些层层叠压的考古遗存，不仅构建了丝路北道文明动态发展的清晰脉络，更为研究东西方文明互鉴、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

唐朝墩的文化内涵：
丝路文明的核心体现

唐朝墩遗址以其丰富的考古发现，深刻诠释了丝绸之路文明的核心基因：首先是开放包容的文明胸襟，这不仅体现在景教寺院与佛教寺庙在城内和谐共存的独特景观，更表现在壁画中纹饰的交相辉映，以及汉文、回鹘文、叙利亚文等多语种题记的并存，生动展现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与接纳。其次是创新融合的技术智慧，罗马式浴场采用“挑空式地板”供热系统，巧妙结合本地建筑材料与工艺。陶器制作也融合东西方技术特色，这种因地制宜的创造性转化彰显了丝路先民的智慧。最后是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不同信仰的信徒在同一空间和睦相处，多元文化元素在建筑、艺术、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有机融合，构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明共同体。作为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唐朝墩见证了东西方物质交换与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和谐典范，唐朝墩再现了各民族共居共生的生动图景。作为多宗教共存的交融缩影，唐朝墩诠释了不同信仰和平共处的文明内核。

唐朝墩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
丝路文明的当代回响

唐朝墩文化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在当代社会中展现出多元的价值，这些价值是丝路文明基因在当代的回响，为我们理解历史、促进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学术价值是唐朝墩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它为西域史研究填补了诸多空白。唐朝墩遗址为研究唐代西域军事制度、宋元时期聚落形态演变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对“丝绸之路北道”的具体路线、政权更迭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唐朝墩遗址的考古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为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化价值是唐朝墩文化遗产的另一重要体现，它对于增强文明认同与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唐朝墩的遗存充分表明，西域地区自唐代起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融的前沿，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生动体现。

社会价值是唐朝墩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它为地方发展和公众教育赋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唐朝墩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可以成为地方文化名片，促进文旅融合，带动区域发展。

同时，唐朝墩见证的跨文明交流对理解“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具有现实启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唐朝墩所体现的文明包容与互鉴精神，为我们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唐朝墩遗址如同一位穿越千年的使者，向我们诉说着丝绸之路的繁华与文明的交融。它不仅是过去的遗址，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其物质遗存承载着多元文明交融的记忆，其精神内涵为当代处理文明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残垣断壁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闪耀着丝路文明的光芒。唐朝墩遗址中的丝路文明基因，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激励着我们在当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扬文明交流的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四川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活动现场

近日，由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协办的“四川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活动”在成都举办。活动采用线下会议与多平台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吸引超60万人次在线观看。

活动围绕“关怀过去”“关注当下”和“关照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为东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保护利用实践与公共传播打开了新的对话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演进经历了从单一性到系统性的转变，其核心是保护理念的升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中国文物保护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演进，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主任燕海鸣系统梳理了其发展历程。2000年发布的第一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借鉴了《威尼斯宪章》精神，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十条基本原则，包括“原址保护”“最小干预”“保护文物环境”等核心理念。2015年修订的第二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出“整体性保护”概念，在文物价值评估体系中新增“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两个维度，并专门增加“合理利用”章节，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理念的与时俱进。

燕海鸣强调“有效保护”这一概念，通过山西临汾东羊后土庙彩塑保护和敦煌莫高窟的管理体系两个案例，阐释整体性保护不仅要关注文物本体，还需统筹考虑结构稳定性、微环境监测与游客体验等多重因素。价值评估方面，他以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工程和圆明园重建争议为例，指出不同价值判断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保护策略，因此新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要根据文物特性确定首要价值取向，为处理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依据。

在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同样经历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迹的自觉性保护意识的萌芽，到现代综合性遗产保护体系的成熟过程。意大利巴里大学考古学教授朱利亚诺·沃尔佩回顾了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理论的历史脉络。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利奥十世任命首位文物监管官，到20世纪意大利文物与艺术品保护专家切萨雷·布兰迪提出的《修复理论》，意大利形成以“可逆性”“兼容性”“可识别性”为核心的保护原则。沃尔佩重点介绍了乔凡尼·乌尔巴尼提出的预防性保护理念，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应与环境管理相结合。

朱利亚诺·沃尔佩分享了Faragola罗马别墅和Siponto古城两个案例。在Faragola别墅的保护中，团队采用数字技术重建遗址原貌，并在2017年火灾后创新性地保留火灾痕迹，将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呈现。Siponto古城的保护则邀请当代艺术家用铁丝网复原古代建筑结构，实现了古今对话。

中意专家在保护理念上展现出诸多共识。双方都强调“最小干预”原则，注重预防性保护，并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差异之处在于，意大利更强调保护过程中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表达，而中国则更注重保护成果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

考古遗址发掘与保护技术

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自1995年在成都黄忠村被发现以来，经过30年的系统发掘与研究，清理出了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与遗存，逐步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占魁详细介绍了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历程。他指出，研究表明金沙遗址的文化序列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2000—前500年），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的演变。社会结构上已呈现出贵族、平民、手工业者的阶级分化。生产生活方式上，金沙先民以稻作为主，铜器制作技术复杂，玉料来源多元，部分技艺受到了良渚、齐家文化的影响，证明了古蜀文明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

三星堆遗址保护实践方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谢振斌详细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中的现场保护体系。针对出土文物面临的物理、化学、生物等风险，团队构建了包含组织管理、应急保护、预防性保护和安全防护的多层次保护框架。通过建设考古大棚和恒温恒湿的考古舱，实现了对发掘环境的精准控制。谢振斌特别介绍了基于风险管理的保护策略，强调现代考古发掘不仅是获取文物信息的过程，更是保护文物的第一现场，需要将保护理念贯穿发掘全过程。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介绍了三星堆保护

关怀过去 关注当下 关照未来

——四川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活动侧记

田湘萍 王璐琪

修复理念发展历程。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自1986年发现祭祀坑以来，经历了从传统工艺到科学技术的转变。早期青铜器修复以锡焊、铆接等传统手法为主，复原了青铜神树、金面罩人头像等文物。近年来，随着3至8号祭祀坑的发掘，三维扫描、3D建模等科技手段成为修复拼接工作的核心手段，开启了“考古+科技”的新模式。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孙杰分享了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保护经验。针对2001年出土的大量象牙，团队创新性地采用有机硅封存技术，通过控制环境湿度延缓象牙的失水过程。经过20多年跟踪监测，证明该方法能有效维持象牙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孙杰团队近年研发的“纳米羟基磷灰石+硅氧烷”协同加固体系，通过提供钙源和增强硅氧化学接枝，使象牙的力学强度提升了20%。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金沙遗址，也为三星堆新出土象牙的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意大利文化部巴里市考古、美术和景观局负责人埃莱娜·德尔卢介绍了普利亚大区在考古遗址监测方面的技术创新。在文物原址保护中，保护团队借助恒温恒湿系统维持洞穴环境稳定，并部署高精度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温湿度、物理位移及地震风险；针对狭小的遗址空间，开发微型监测设备。这些经验对中国南方潮湿环境下的遗址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意大利卡斯特罗梅迪亚诺博物馆考古部门负责人安娜·露西亚·泰佩斯塔介绍了普利亚大区Messapi遗址Rudiae地下墓穴的保护与修复。该遗址是古罗马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拥有城墙遗址与地下墓穴。安娜·露西亚·泰佩斯塔分享了考古工作者19世纪至20世纪的考古记录，该案例是科学分析与传统技术结合的优秀体现。

比较两地的保护技术可以发现，双方都面临着如何平衡保护与展示、如何处理现代干预与历史真实性的挑战，以上或可成为两地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

博物馆展示与公共参与

博物馆功能的演变始终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及公众需求的变化紧密相连。从早期以收藏和展示为核心的“文化殿堂”，到如今兼具教育、研究、社区服务等多种角色的综合性机构，博物馆的功能性质不断被重新定义。

意大利普利亚大区博物馆执行总馆长路易吉·德·卢卡探讨了博物馆的社会意义，并通过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的实践案例进行阐释。他指出，普利亚的博物馆形态多样，既有传统考古遗址、自然历史展馆，也有记录工业发展的橄榄油作坊和面包博物馆，甚至包括无围墙的露天文化景观。这些场馆不论规模大小，都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他强调，博物馆的价值不在于藏品数量或技术设备，而在于其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能力，博物馆的核心作用是促进社会思考，帮助人们理解自身与历史的联系。他主张以更开放的视角看待博物馆，使其成为连接地方记忆和全球叙事的桥梁。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以“凸显文化遗产价值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题，介绍了成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花重锦官城”基本陈列通过3200件文物讲述成都4500年文明史，76个临展则形成了品质高、号召力强的临展特展的口碑。黄晓枫强调城市博物馆不仅要展示历史，更要连接当下，让市民在文化认同中获得幸福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分享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创新理念。新馆展览以“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板块，全面展示三星堆考古成果和文化内涵。针对新出土文物，考古团队采用AI算法辅助文物拼对，通过3D打印技术复原青铜神坛等重器，实现了保护与展示的平衡。吴维羲介绍，新馆特别设计了1300平方米的沉浸式互动厅，通过“考古+科技”展陈方式，既保护了文物安全，又提升了观众体验，代表了大遗址展示的新趋势。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系统介绍了金沙遗址博物馆构建的多元展示体系：基本陈列以祭祀区原状展示为核心，“5+N”临时展览体系包括考古发现展、文物专题展、区域文明展、世界文明展和艺术金沙展五大系列。同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专职副书记郑漫雨则从遗址保护、社区互动和城市文化地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金沙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

正如朱利亚诺·沃尔佩教授所言：“构成珍珠项链的不是珍珠，而是串珠的线”。文化遗产工作者就是这条连接古今、串起文明的线。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化背景下，此次会议呈现出的跨文明对话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遗产保护理论体系，让古老文明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